亲子游中红色资源思政教育效能的强化路径

■ 黄正 黄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红色资源作为革命历史与精神文化的鲜活载体,在亲子旅游情境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政教育效能。在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发展背景下,红色资源与亲子旅游的结合呈现出显著的育人价值。这类资源承载的革命精神谱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为青少年价值观塑造提供了生动教材。近年来,红色旅游年均接待游客数量呈增长态势,且在文旅融合战略推动下,亲子游已成为家庭出游的主流形式。然而,现有实践仍面临三重矛盾:一是资源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尚未充分转化为教育效能;二是活动设计缺乏对青少年认知规律与家庭互动特性的针对性;三是传统模式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的学习需求。随着“大思政课”理念的深化与文旅融合趋势的推进,红色资源亟须通过系统化路径创新,实现从“资源呈现”到“效能输出”的跃升。

深挖红色资源内涵,强化教育主题凝练

红色资源的思政效能强化需要以内容深度开发为基础。思政教育内容是对思政资源的整合与加工,经过提炼之后的内容更具可塑性。在亲子旅游情境中,思政教育的内容资源体现为革命精神、时代精神、先进文化和道德规范等。这要求我们不仅要系统梳理红色历史事件的脉络,还要提炼核心精神符号,将革命遗址、文物背后的英雄事迹转化为青少年可感知、能引发共鸣的价值观教育素材。例如,韶山革命纪念地通过“我的韶山行”研学活动,使青少年在角色代入中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内核。其次,应结合认知发展规律建立分层教育框架:针对低龄儿童开发红色绘本、互动游戏,潜移默化地培养其对红色文化的兴趣;面向青少年设置历史思辨任务,引导其通过文献考证还原历史真相,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历史逻辑能力。最后,需构建家庭共学机制,设计亲子协作任务,如开展“红色家书共读”活动,让父母与孩子共同解读革命家书,通过代际对话促进价值观传递。

强化目标导向设计,激活主体参与动能

教育目标的有效达成需遵循认知发展规律设计参与路径,通过结构化激励机制激活主体内在动力。基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6岁至12岁儿童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需要通过具象化、任务化的活动设计激发其参与热情。针对亲子家庭特点,设计“沉浸式参与+趣味化实践”的教育路径,实践中可采用“目标分级—任务驱动—即时激励”的机制,依据年龄特征设置分层目标:低龄段侧重情感共鸣(如革命歌曲传唱),高龄段强调价值内化(如历史事件分析)。采取“任务卡+积分”模式,通过闯关任务驱动主动探索;鼓励家庭参与“打卡集章”类活动,在本土红色教育基地设置互动打卡点,完成指定任务后兑换奖励,激发孩子主动探索的积极性。这种结构化设计将价值引导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模块,既契合青少年认知发展需求,又通过即时反馈强化学习动机,形成“体验—认知—实践”的良性循环。

创新载体形式,提升教育效能

载体形态的多元化与立体化建构。作为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实现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择与建构需遵循宏观规划与微观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宏观层面应建立“主题—资源—活动“的协同框架;微观层面需推进场景化创新。例如,重庆红岩景区开发了包含红岩小导游角色体验、红岩精神主题互动宣讲平台及沉浸式历史情景剧场等一系列项目,形成了立体化载体体系,通过场景化、具象化的实践路径,将价值引导有机融入亲子旅游的情境,能够有效提升教育活动的参与度。此类载体设计既保留红色文化精神内核,又契合亲子家庭的体验需求,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青少年的思政教育。

数智赋能的互动式系统体系构建。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红色资源教育效能的提升提供新契机。应科学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红色资源的思政教育,充分发挥其在信息时代对青少年的引导教育功能。具体而言,可以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专项平台。第一,在形式上,保证界面设计简洁化、导航便捷化以及搜索功能高效化,使家庭精准获取资源信息;第二,在内容上,不仅要涵盖红色旅游地的革命历史、伟人事迹以及优秀精神等核心要素,还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根据浏览历史和兴趣标签提供个性化推荐;第三,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开放留言和评论功能,形成“学习—提问—共创”的互动氛围;第四,整合相关资源,建立红色资源学习资料库,为亲子共学提供辅助。

通过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教育目标的精准聚焦以及载体形式的创新应用,能有效强化红色资源的思政教育效能,助力培育具有家国情怀、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这一进程不仅强化了青少年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自信,更通过“行走的思政课”将历史精神转化为行动自觉。

此文系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基于核心素养的新时代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yjg23013),重庆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410637040)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语文教学与技术启蒙的创新融合

■ 邸威威

摘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推进,科技在教育中的深度渗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语文教学不仅承担着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使命,更承担着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升的责任。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将技术启蒙有效融入语文教学,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语文教学;技术启蒙;融合发展;基础教育

一、教材文本与技术启蒙的有机融合

语文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启蒙素材,教师要深度挖掘其中潜在的技术元素,并合理渗透到教学实践中。在语文教学中实施技术启蒙,不仅体现了学科工具性和实践性的结合,还为学生提供了思维训练和创造性表达的契机。教材作为教学的基础,必须依托学科知识体系,科学合理地融合技术启蒙内容,而非单纯地依赖技术工具的引入。

首先,技术启蒙并非单一途径的实践,而是要依托语文学科的特点进行合理渗透。每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教学目标和特点,技术启蒙应当尊重这些学科特性。例如,在语文教学中,技术启蒙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教授,而是要通过语文知识的实践,帮助学生理解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其次,语文大单元教学的方式为技术启蒙的融入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空间。语文大单元教学强调知识的模块化和综合性,鼓励跨学科整合,使学生能够在不同单元之间建立起知识的联系,并在多个层次上培养其技术素养。例如,在语文课文《鲁班造锯》的教学中,教师除了可以引导学生学习文本的故事内容和人物品质外,还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与锯子制造相关的材料技术、结构设计等技术内容,帮助学生认识到语文学习与技术发展的内在联系。

二、群文阅读与技术启蒙的深度融合

群文阅读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强调多篇文本的联合阅读,通过不同角度的结合来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启蒙通过多元化的文本内容和实际应用案例,帮助学生理解不同领域的技术内容,拓宽其视野。例如,通过群文阅读《太空生活趣事多》《纳米技术》两篇课文,学生不仅能学习到关于太空探索的基本知识,还能够了解相关的航天技术、材料技术等方面内容,从而激发他们对科技的兴趣和探索欲。

群文阅读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更加全面的技术视野,帮助学生在多文本的学习中,不仅积累语文知识,还能潜移默化地吸收技术启蒙内容。教师可以通过设计相关的互动活动,如“我是金牌讲解员”等角色扮演游戏,引导学生将所学技术内容进行复述和展示,既能够提升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又能够增强其对技术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三、写作板块与技术启蒙的实践融合

语文写作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写作任务的设计,教师将技术启蒙内容逐步渗透到学生的创作过程中,使学生在表达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技术概念的理解。与传统的写作教学不同,基于技术启蒙的写作教学,并非只是让学生写“范文”,而是让学生在实际操作和体验中逐步积累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例如,在部编版语文上册第五单元习作例文《风向袋的制作》一课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任务,每个小组负责不同的环节,如设计、制作、说明等。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了如何进行技术操作,还能通过写作任务,把技术原理和操作步骤转化为语言表达的内容,进一步增强其技术素养。

通过生动有趣的写作任务,学生能够在实践中获得技术技能的操作体验,了解并运用技术原理,从而促进其对技术知识的内化。同时,教师通过设置综合性写作任务,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提升其语言表达能力和技术实践能力。

四、校企合作推动语文教学的技术创新

校企合作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和平台,尤其是在技术启蒙的融入过程中,企业的技术支持和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够有机结合,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企业不仅为学校提供先进的教育技术工具,还能够提供技术培训和项目支持,使教师能够更好地在课堂中运用现代科技。例如,校企合作通过开发专门的教学平台或应用程序,提供智能化的教学辅助工具,帮助教师更加高效地设计和实施技术启蒙教学。同时,企业的技术专家和学校的教育研究者共同进行教育创新,探索适合本地区、本校的技术启蒙教学模式。这种合作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也推动了教育理念的创新。

语文教学中的技术启蒙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任务,需要教师根据教材的特点,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通过大单元教学、群文阅读以及写作板块等多种途径,合理融入技术启蒙内容。校企合作为这一任务提供了实践支持,帮助教师提升技术素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终实现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通过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和技术启蒙的实践,语文教学将在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中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刘花.技术启蒙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研究[D].西安外国语大学:2023.

[2]李小姣,周永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J].四川教育,2025(01):24-25.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第一实验学校)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大同理想的差异性研究

■ 杨博宇

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大同理想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中国社会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两者虽然共同具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两种社会理想模式,但是两种理想社会在理论本质、实现路径和依靠力量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本质上存在科学与空想的鸿沟,但这并没有否定大同理想所存有的积极因素。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大同理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新的诠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同理想;社会理想;差异性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大同理想产生于中国的封建小农社会,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进行集团生产的社会,而大同理想主张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大同理想”经过时间的淘洗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并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生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与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相似,但这种相似无法掩盖两种理想社会所存在的本质差异。

一、理论本质的差异:科学与空想

大同理想起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更多地体现为空想性,因为这种理想缺乏科学理论依据,并未经过历史规律和现实社会的实践与分析,主要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道德设想。大同理想最早由儒家界定,《礼记》中描述了一个和谐、有序、美好的社会,后世也在这一描述的基础上加以丰富,但是大同理想从本质上看是空想性的。大同理想产生于封建社会之上,是由于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而构想出一种理想社会形态,这种设想并没有理论依据,只是认为这样的社会形态是人们所向往的,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所以就单纯地将其设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设想不需要对历史规律和现实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和逻辑论证,也不考虑这一设想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的问题,只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出发的简单设想,企图直接超越现实寻求彻底解放,虽然也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缺陷,但只是一种主观上的愿望、一种美好的空想。相反,马克思主义则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通过对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解,立足于现实与实践,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提出了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

从发展历程中看,因为存在“公天下”与“家天下”的矛盾,所以大同理想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边缘地带,直到近现代民主主义者才着手将大同理想与西方思想进行结合改造,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皆蕴含着大同理想的色彩,但是这些构想的核心依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解决方案,对社会基本规律依旧缺乏科学认识,在这些构想之中,他们对大同理想的理解和丰富也只是停留在文学性描述层面,并没有彻底改变其空想性的本质,仅是借用这一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构想的名号,现实的改良或革命明显地具有落后性和不彻底性。共产主义理想则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不断走向现实,列宁等人将共产主义理想推向实践,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对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样也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是科学的、是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存在空想与科学的分野。大同理想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空想性质的美好愿望,对理想社会的认识只是道德和伦理上的抒发,并没有切实可行的现实依据,共产主义理想则是通过科学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将理想社会变为现实。

二、实现路径的对立:克己复礼与革命

大同理想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觉,强调“克己复礼”,通过提升个体道德素养来实现社会和谐。大同社会所描述的商品货物不必私藏、社会弱者皆有所养、劳动不必为己等等都是“天下为公”的具体展现,这一理想社会需要通过提高个体的道德素养从而克制自身欲望与邪念,来实现社会的道德自觉,对于个体的约束使得“克己复礼”逐渐成为实现这一道德自觉的根本要求。这种自觉性与能动性正切合了大同社会所要求的道德状态,个体在精神与行为上都实现高度自觉,群体形成了统一的道德价值,“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自然就会在此基础上成型。

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社会变革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集体力量。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理论上会发生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会取代旧的形态从而解放生产力的运动,而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导致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极端尖锐,在《共产党宣言》中,“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当这种起义发生时,资产阶级必然会动用国家手段打压反动力量来维护自身统治,无产者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进行革命并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必须以革命的形式颠覆资本主义框架,推进社会形态向更高一阶变革,这种革命的手段代表了“武器的批判”与个人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三、依靠力量的差异:个体与群体

在实现理想社会的力量来源方面,大同理想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觉,进而形成“公天下”治理模式。事实上,大同理想被纳入了封建制度的“家天下”框架中后,大同理想就发生了形变,“家天下”成为大同社会的总的原则,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蓝图成为封建君主的治世目标,实现大同理想的依靠力量由社会中的自觉个体变成了封建统治者即有道之君。这种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天下”的初始原则,在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民本思想、君权神授等观念虽然深刻地影响了统治者决策的制定,但其本质上还是独断专行,这些敬民、爱民的思想仅仅作为限制君主决策不合理性的道德因素,并不能产生根本性作用,采纳与否依旧由统治者个人意志决定。无论是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还是封建君主的独断专行,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依靠力量都被集中在了个体身上,这种凭借个人的自主自觉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或变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作用,但个人意志的能动变化必然不能形成稳定且彻底的力量,只寄希望于单独的个体必然无法实现理想社会目标,且容易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限制,无法形成真正的“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切的社会变革最终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完成。资本家将工人剥削殆尽,社会逐渐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在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且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逐渐由自发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明确了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实现无阶级差别的社会,使人类社会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阶段。这种目标的实现依靠的是现实存在的阶级力量,而非个体的自主自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自然而然地淘汰了在政治立场、道德价值上落后的社会个体,基于此所汇聚而成的合力对社会的变革具有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群众史观,把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作为“无产阶级的运动”的依靠力量,而根植于封建文化的大同理想在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之后,虽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的治世之道,但其本质上依旧存在个体意志的专横,没能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并形成统一的合力,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失败也正因如此,个体的不确定性最终致使革命力量分崩离析。

四、大同理想的积极成分

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理想虽然在本质上有着科学性和空想性的鸿沟,但这并没有否定大同理想的积极作用。大同社会是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构建,其中有着按需分配、天下为公、关系和谐等进步思想,这些意识的出现超越了当时的社会存在而具有进步意义。在近代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大同理想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之中,中国本土理想社会的面貌切合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诸多方面,以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解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想社会蓝图进行比较,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之间产生了浓厚的亲和性。

大同理想作为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社会理想,千百年间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付诸实践,后经近代民主主义者改造融合,大同理想以一种新的状态重新回归并被视为救国之道。大同理想的归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有的积极成分,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早期知识分子借用大同理想来解读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均受到了大同理想的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的深入,大同理想的局限性逐渐明晰,空想与科学的鸿沟注定无法让这两种思想等同。虽然大同理想的空想本质并不能让其畅想的社会蓝图变为现实,更无法提供切实的方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实践,但这一理想所构建出的美好生活状态与社会样貌在许多方面与共产主义社会相契合。大同理想社会虽然处于物质条件的低级阶段,但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是最为纯洁、朴素的一般性总结。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社会理想在相同的追求下产生了共鸣,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大同理想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新的生机,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中国人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最完整的状态和实现方案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以展现。

结论

大同理想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的思想文化,由于其空想性质,未能提供切实的社会变革方案,但它架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又以本土化的理想社会目标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当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社会相碰撞时,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实现。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生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了更加强大的活力,大同理想也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新的诠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版

[3]高尚,董四代.与大同思想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10).

[4]闫丽.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5]金民卿,李张容.社会理想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融合[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01).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